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2.020

# 一部“充实而有光辉”的新闻史著作 ——评《〈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 (1897—1911)》

许永超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2-0121-03

引用格式: 许永超. 一部“充实而有光辉”的新闻史著作: 评《〈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1897—1911)》[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121-123.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 湖南的《湘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三足鼎立, 堪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维新报刊, 《湘报》被誉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 受到学界重视。作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结项成果, 阳海洪与阳海燕合著的《〈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1897—1911)》一书, 可能是目前为止关于《湘报》最详尽的个案研究了。全书立足于现代性立场, 对《湘报》进行了整体性呈现, 结构严谨, 值得一读。

史学家严耕望以“充实而有光辉”作为评价史学论著的标准。“充实”最主要是材料丰富, 论断平允, 踏踏实实, 不发空论; “光辉”则难以具体说明, 简单说是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 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 且有创获。<sup>[1]</sup>《〈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1897—1911)》一书史料功夫扎实, 材料收集全面, 其“光辉之处”在于其现代性视角。作者认为, 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在于“中国缺位”, “有意无意遮蔽了中国新闻事业的问题意识和规律, 放弃了中国独有文化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移植过程的再造。”如用柯文的话讲, 就是“未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现代性全球扩展的语境中, 现代性依然能够穿过区域文化性的障壁, 推动湖南新闻事业的现代性进展。无疑, 现代性在此扩展中, 会打上区域文化的烙印, 呈现出“湖南性”特征。作者将《湘报》的发展置于湖湘文化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这本专著可谓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有益尝试。在笔者看来, 本书对《湘报》“民权”观的阐释与理解, 最能体现其“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特点。

民权这个词是西文 democracy (民主) 的日本译法。日本人之所以把 democracy 翻译成“民权”, 是以为“民权”一词更能凸显“人民权力”之意。依据作者考察, “起民权”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关于“民权”的内涵。(1) 民权与政治合法性。《湘报》从民权入手, 对君民关系进行重新阐释与建构, 解构了“君权神授”观。《湘报》认为, 积民而成国家, 民众才是国家的权力主体, 由此否定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性, 确认现代国家之公民当享有的权利。(2) 民权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依张灏先生的意见, 民族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 他特别强调 1895 年以后大约 25 年的时间, 是中国

收稿日期: 2019-01-05

作者简介: 许永超(1985—), 男, 辽宁开原人, 华中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论。

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而民族主义的产生,除了外来帝国主义的刺激,现代传播媒体网络在1895年以后大规模出现,包括报刊、出版公司、新式学校和社团,是必要条件之一。<sup>[2]</sup>报纸赋予“一国”以形式。本书作者认为,《湘报》刊载的内容,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如唐才常主张国家需有“自主之权”,才能“自保其国”。此外《湘报》还提出守法和夷的平等外交观念。其虽然仍称对方为“夷”,但似乎华夷之间已无高下等差之分,主张与西方和平交往。显然,守法和夷要比盲目排外高明得多。此处已有现代“边界”意识,外交观念已经接近现代外交观念。

作者还注意到了《湘报》关于“守信和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论述。在《湘报》看来,历史并非都是现代化的阻碍,其作为一种历史、思想资源而存在,经过重新解释,能够用来应对当下之问题。在这样的观念下,历史便不是僵硬的,而是动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视当时的人物为能动体,其行动虽受传统和社会各种结构约束,但并非毫无主动性。《湘报》使用“守信和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资源,诠释了当下所应采取的外交路线。

第二层意思是湖南士绅在以《湘报》为中心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互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权”意识,即《湘报》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它在何种程度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关系。本书作者注意到《湘报》在印刷技术、媒介形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进展外,还注意到《湘报》作为大众传媒,与传统书院议政不同,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士人的权利空间。《湘报》上刊登的180篇论说,共有100位作者,其中87位作者只是士林当中的低端人物,在既有的以官位、功名、资历为尺度的差序格局下,其对于公共事务本无发言资格,但却因为《湘报》的出现,他们获得了纵论省事乃至国事的机会。这一点在传统中国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的语境下颇具意义,所以梁启超《湘报》创办后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明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胜数”。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的现代形式是镶嵌在原

有中国社会脉络当中的,其必依托原社会结构,即所谓“新旧士人”。当时,新派士人占据报刊、学会、学堂等文化事业高地。《湘报》、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三位一体,围绕三者,我们似乎能够想象这一群体在时务学堂纵论时事,然后撰写成文,刊之于《湘报》,报纸再顺着南学会各地分会张贴流转的情形。无疑,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士人利用《湘报》、南学会、时务学堂等制度化媒介,有效扩大了低层士人参政范围,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化群落,但是这种组织是有着清晰边界的。从《湘报》刊载的文章内容来看,很少有守旧派人士王先谦那一群体的文章,《湘报》几乎被维新人士垄断了。此后,在两者的冲突中,冲突的方式是传统的,内容亦是传统的。《湘报》对于王先谦等的指责不敢直接回应,而是在纲常伦理上为自己辩护。其选用的回应方式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回应方式——攻击书院,甚至攻击王本人。显而易见,报纸这一现代传媒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激化矛盾的角色。

从《湘报》、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三位一体的形式以及其后《苏报》与中国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紧紧结合的形式中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媒介化政治。<sup>[3]</sup>《湘报》虽扩大了民权,但有着严格边界,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面。《湘报》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其存在意义就是“起民权”,这既包括观念方面,也包括实践方面。从历史上看,有组织的力量能够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代报刊的出现,则辅助了多数人的组织,这和历史朝有组织的多数(即民主)统治无组织的少数转向是一致的。唐才常介绍《湘报》创办背景时的说法也印证这一点——“湘学报文字过于艰深,不能满足维新运动的需要,决定创办一份比较通俗的日报。”

综上所述,通过对《湘报》在“起民权”上的考察,作者很好地贯彻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理念。在中国思想体系中,有“民本”而无“民权”。民权观念在是西方刺激下舶来的,但这种刺激仅仅是作为一种资源,供维新士人取用而已,其问题是救亡图存,新式报刊乃至现代物质、制度和观念,都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服务。但是其作用是存在边界的,其运作方式受到历史传统的制

约，这在时务学堂事件中表现特别明显。正如希尔斯所说，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包括物质产品，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思想，对人和事件、习惯和体制的认识。传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变体链”。<sup>[4]</sup>

《湘报》的办报方式可以说是早期的书生办报方式。书生办报为中国新闻史上一特殊之现象，其将融合了现代精神的儒家“士”精神灌注到现代报刊之中。书生即具公心、独立、有责任感而敢言的知识人，其对现实深刻关心并有强烈使命感；办报即以道自任，创办报刊，批判一切不合理现象，试图建立一舆论中心，影响政府决策。

本书选取《湘报》为个案，以现代性聚焦观察，通过对办报主体——维新士人、报刊技术、采编

业务、广告经营，乃至新闻观念、报刊与政府关系、新旧士人之间的冲突的整体勾勒，呈现出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立体图景，不失为“从中国发现历史”、探讨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有益尝试。

#### 参考文献：

- [1] 严耕望. 治史三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0-61.
- [2] 张 灏.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35-136.
- [3] 黄 旦. 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 [4] E·希尔斯. 论传统 [M]. 傅 铿，吕 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 120 页）食品包装、果蔬汁包装、日用快消品包装的设计问题展开了探讨。著作结合一些精心挑选的案例，条理清晰地分析了这些设计的背景、思路及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伴随着材料科学、微电子学的发展以及数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包装行业的渗透，智能化包装领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sup>[3]</sup>《绿》著一书敏锐地捕捉到了智能包装技术与生态包装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新型材料、功能结构、信息技术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如何赋予药品包装智能元素，以实现更为安全、环保的功能效用，体现出作者前瞻的学术视野和务实的研究态度。

《绿》著一书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侧重理论的思辨与批判，下篇侧重设计的策略与方法，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交相辉映，应该能使两类读者都获益匪浅。

总而言之，《绿》著将多学科知识进行了有机

结合，力图开辟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包装设计研究路径，体现出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生态设计蓬勃兴起的当下，《绿》著的出版无疑能为我们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参照文本，也必将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

#### 参考文献：

- [1] 罗定提，龚苗苗，鲁 芳，等. 包装学科内涵及学科体系研究 [J]. 包装学报，2017，9(6)：77.
- [2] 王舟晶. 完善我国包装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包装行业发展 [J]. 法制与社会，2018(4)：172.
- [3] 高开辉.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电商产品包装研究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4)：120.

责任编辑：黄声波